

李卫萍：海岛女炮手

本报记者卢珍珍/文 杨辉/摄

李卫萍的人生，被她的名字，划分成两块。上半场，她叫李卫平。父亲给了她这个名字，希望她长大后能维护和平。年幼时，因为父亲工作需要，她随同家人一起踏上了大陈岛。自此，才有了海岛女民兵李卫萍的故事。作为大陈岛女炮班的第一任班长，她所带的女炮班，在三军合练中，曾获得南京军区的肯定。但很多大陈岛老兵晓得李卫萍，可能仅仅因为她和岛上的女人，曾抢着替他们洗衣服、洗被子，与她有过一面之缘。很多人都说李卫萍的名字，过于男性化。想来想去，李卫萍把名字改成了李卫萍。那时，她正好开始从事妇女工作，这也是她人生下半场的工作重点。不管是李卫平，还是李卫萍，她和女炮班如同一枝绚丽的花朵，摇曳在海岛之上。

我以为我要死了

去大陈岛的船上，李卫萍以为自己快要死了。拥挤逼仄的交通船，坐满了来往海岛与海门之间的人。鱼腥味夹杂着人的体臭，还混了船上厕所的味道，一路颠着颠着，李卫萍呕吐了起来。一反胃，肚子里的蛔虫呕了出来，半条身子挂在嘴边，把李卫萍吓坏了，大哭了起来。“我心里害怕啊，以为自己来到什么坏地方，这地方怎么能让人从嘴巴里吐出虫子来。”那一年是1957年，李卫萍9岁。1955年，大陈岛解放。不久后，李卫萍的父亲李崇富，被组织派到大陈镇当副镇长。为了照顾父亲，李卫萍的母亲带着一对子女，一起迁去了大陈岛。看着海平面浮浮沉沉，年幼的李卫萍心中各种忐忑，当船体靠近下大陈，踏上岛，李卫萍的眼睛里都是荒凉。

在岛上，李卫萍知道了第一个地名，下大陈三角街，他们一家人居住的地方。“什么都不方便。”清苦，是岛上生活的基本节奏。“一开始电话也没有，后来有了电话，还得先转到潮队。”让李卫萍觉得最可惜的是，一到岛上，她的学业几乎就荒废了。岛上人口少，一个教室里，五六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。“五年级学生坐一边，六年级学生坐一边，老师教五年级时，六年级的学生自己写作业。”两个年级的学生人数，还不到20个。李卫萍说，这种交叉授课，“根本学不了，思想总是走火”。

磕磕绊绊学到初一，父亲就让她去搞生产，学习彻底中断了。“弟弟去挑虾、晒虾，我去剖墨鱼、晒墨鱼。”每年四五月份，是墨鱼丰收的季节。李卫萍从没看过这么多墨鱼，它们趴在岩石上，徒手就能捞到。一只木船每次下海，起码能捞上四五百斤墨鱼。上岸之后，李卫萍和姑娘们就把墨鱼剖开肚子，晾晒起来。这是晒海带之外，她们经常干的事。渐渐地，李卫萍习惯了。

春季，岛上潮湿，浓雾不开，三四米远都看不清对方的样子，她已经见惯不怪。唯独台风天，狂啸的海风，把屋顶都掀开时，她和弟弟躲在床底下，同样惴惴不安。1962年，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，局势一度很紧张。“部队一个副指导员，负责军民联防工作，还派了两个战士，专门对接我们。”全民皆兵，岛上的男女老少，开始拿起了枪支。“有的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家庭班，整个家庭成员，一起练习。”

自此，身穿花衬衫、头扎两条辫子的李卫萍，腰上缠起了子弹带，手上端起了步枪，成了一名女民兵。

海岛女炮班

同是1962年，海岛上的第一个女炮班出现了。“不行，不行，潘荷兰大姐是妇女主任，吴星云是个老民兵骨干，都比我强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哪能当班长？”上大陈大里香村党支部王书记，看准了李卫萍的闯劲，推荐她当班长。后来，王书记带着李卫萍走上了一条山道。山道的山脚下，断壁残垣间，还标有英文字样的美国特务机关“西方企业公司大陈分公司”。上坡上，有“国民党大陈卫戍区”司令胡宗南的暗哨。海边悬崖上，是囚禁党员、群众的监狱。目睹了过往，李卫萍答应了。跟着部队教员，包括李卫萍在内的八个成员，开始学习85加农炮的零件、性能。“炮栓什么作用？膛线几

根？蒙上眼睛拆炮栓，你都得练到麻溜。”放炮时，距离、风向，则涉及了数学、物理等知识。

初一文化水平的李卫萍，咬咬牙，还能琢磨透。女炮班里，不认识字的妇女，为了记住火炮复杂的名称、计算等，常常用三角、圆圈、方块来标记。

第一次放炮，作为班长，李卫萍下令前，心里都是紧张。计算好角度，对接好瞄准手和装填手，一声“放”，山坳里的泥块和小石块，噼里啪啦往下滚。“我心里是吓死了，但没说，就装在肚子里。”

除了搞生产，女炮班里的成员，就是各种训练，练射击、练放炮、练救伤员。每次演习，她们都按实战标准来。

一声“占领炮阵地”，姑娘们就住目标冲，跑几百米，指令要求射击，“要求特别高，都是无依托射击”，子弹打完几发，又向炮阵地进攻。演练救伤员时，“人快速从山坡上滚下来，来到伤者旁边，再拖伤者到旁边包扎。”

“夏天头上晒脚底烤，冬天海风呼呼呼，训练是特别苦的。”女人当男人用，一箱炮弹45公斤重，女炮手吴星云、王冬梅照样扛着跑，“那个时候的姑娘心思单纯，不过太苦的时候，也会掉眼泪。”

部队教员特地给女炮班编了首歌，歌里有这么一句词：“放下老大抱老二，老三一旁叫妈妈”，写的就是女炮手潘荷兰。

八个女炮手里，两三个已经成家。“潘荷兰每次出来训练，还得带着孩子，小孩就在训练场上玩。”放下步枪，卸下子弹带，她们走回家，还得烧饭、洗衣服。

江省军区的肯定，李卫萍个人立了一个三等功。

军民鱼水情

很多大陈岛老兵，都记着李卫萍的名字。“她们女民兵做的军民工作，非常好。”电话里，大陈岛老兵袁相月向记者说起。

每逢五一、八一、十一等节日，军民都会一起搞联合汇演。围绕各个时期党宣传的内容，部队编成小品，让李卫萍一帮女民兵来演。

李卫萍至今记得，10多岁的自己，曾配合宣传破除迷信，上台演老太太的样子。她头发梳成了发髻，脸上画满了皱纹，身穿黑色对襟衣，还围了一个围裙。年龄差带来的喜感，导致她一上台，就迎来了笑声。

更多的时候，她和女民兵上台，把女炮班的事迹唱出来。除了汇演，岛上的女人经常给部队洗衣服、洗被子。

“我们一次去20多个人，把他们的被子拆开来洗。”部队里不好意思的人，还特地把衣服、被子藏起来。“他们藏，我们去找，给他们洗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很有意思。”李卫萍笑了。

20多个人，把部队里拆下来的被套，统一拿到井水边洗。趁着好天气，洗好的被套平摊在茅草上，远远看去，草黄色的被套铺满了大半个山头。

以前军民之间的关系，好到什么程度？李卫萍的母亲曾说过，卫生员袁相月真的好，比她的小儿子还好，还细心。



第二十一期·人物名片

李卫萍，1948年11月1日出生，海门霞壁镇东岸路人。她是大陈岛女民兵，第一届女炮班班长。1965年后，分别在大陈镇、椒江椒渔办事处、白云街道工作过，2003年退休。



再走垦荒之路 重温燃情岁月



女性也是半边天

本报记者卢珍珍

30多岁的时候，李卫萍的左耳，开始出现嗡嗡声。她和以前的女炮手交流说：“可能是年纪大了，耳朵都不好了。”

对方告诉她，一圈女炮手里，个个都有这个毛病。女炮手的身份，是李卫萍这辈子最特殊的经历。因为女性这个群体，她们曾受到《浙江日报》的关注，也会被拿来和男性比较。

“和男人比，我们一点也不差。”李卫萍口中经常提起的两个女炮手，就是吴星云和王冬梅，“她们俩力气大，扛炮弹没问题，男人做的事比如挖坑道，她们也去。”下海种海带，上山种田地，男人能做的，她们照样可以。

离开女炮班后，李卫萍一直从事着妇女工作，最早就是在大陈镇当妇女主任。

为女性争取利益，她是较真的。那个年代，同样上山下海，男性和女性的工分是不一样的。“同样下海种海带，男人计10个工分，女人就只有5个工分。”党组织开会时，她为吴星云和王冬梅努力争取过，虽然最终并未争取到同工同酬，但比原先的提高了一些。

李卫萍的记忆里，女性就是半边天。因为看不惯女人抛头露面，装填手吴星云，每次去训练场，都会被老公苛责。吴星云照样怼回去，“你也不去训练，我也不去训练，国家谁去保卫？你现在生活好了，也是革命先烈打下来的。”

同是妇女工作者，杨菊兰每次出门给其他家庭调解时，她的丈夫就会不高兴。“她老公不让她去，没办法，杨菊兰和他斗。”

李卫萍的爱人郑道隆，曾是杭州一个部队的卫生员。和李卫萍谈对象时，郑道隆根本不知道，她曾经是个女炮手。直到看到媒体上的报道，直到他去大陈岛探亲时，部队的人和他说起，大陈岛女炮班，名声响当当。

“她这个人，就是比较好胜，什么事都要追求完美。”郑道隆说，这是李卫萍的性格。

两个人结婚后，李卫萍仍留在大陈岛，郑道隆则在杭州。婚后，两人生下两个女儿。郑道隆至今记得两通电话。

一通电话，是李卫萍的同事打来的。“她告诉我，家里两个小孩都发烧了，没人带，让我赶紧请假回来。”

另一通电话，是李卫萍自己打过来的。“那个时候幼儿园去大会堂看电影，我的大女儿迟到了，她自己想从一个小洞钻进去。”没想到，等到电影结束，四岁的大女儿仍卡在洞口，经过的人听到哭声，大家合力把墙体慢慢敲开，才把女儿救出来。

那两通电话，都让郑道隆头顶冒汗。“她很忙，很少时间管小孩。”毫不夸张地说，大陈岛的角角落落，李卫萍都用双脚走过。郑道隆说，若是李卫萍去黄岩开会，她得背一个孩子，手里牵一个孩子，另一只手还得拿行李。

现在退休了，每周一、周三，李卫萍还会去老年大学学唱歌。郑道隆开玩笑说：“我都很少听她唱歌。”郑道隆可能还不知道，当年军民联合汇演时，李卫萍不知上台过多少次，唱过多少次红歌。



三军合练

李卫萍离开女炮班之前，新炮手徐玉琴、王招云、吴珠琴，分别担任了预备炮长、预备瞄准手、预备装填手。新老炮手交接时，女炮班又面临着三军合练。“就在甲午岩旁边训练，日夜都在练。”黄土地上铺上一层茅草，再铺上一层草席，合着一层棉被，所有人都在露天睡觉，从1964年下半年，一直练到1965年上半年。

对一，她们用分组训练的方式进行着。李卫萍领着徐玉琴，肩挨肩，手把手教她炮长的专业。李卫萍出了一大串习题，让徐玉琴学着计算。一开始，徐玉琴还能沉得住气，算着算着，没了方向。

“我当炮手蛮好，干嘛要学炮长？我文化低，学不来。”“我刚当上炮长的时候，也哭过。”李卫萍说，“不过最难的不是我。”李卫萍向徐玉琴说起了老炮手不认字，只能用符号标识火炮构造的事情。

看着李卫萍，整理好心情，徐玉琴愿意重新拿起计算尺、讲义夹。合练的日子越靠近，流感来了，女炮班六个人中招了。“合练就是实战，轻伤不下火线！”王招云非常坚定，“女炮班一定要把炮打响。”

在那一次合练中，海岛女炮班得到了南京军区、浙

大陈岛的医疗条件很差，大岙里村的村民，一旦有个头疼脑热，就会想起袁相月。

李卫萍说了几件事情。一次，村里一个人出门讨馒头，双脚踏到雷，被炸伤。“现在他脚没了，但命留下了，靠的就是袁相月。”

还有一次，李卫萍一家都出门了。李卫萍的母亲深夜高烧，袁相月过来自己烧水，给她母亲喂药。“那个晚上，等母亲稍微缓过来后，他才走，人真的很好。”

李卫萍能叫得出来的老兵，还有王先钊，“他个子小小的，负责养猪，我们开玩笑叫他‘养猪员’。”李卫萍说，就是养猪这件事，王先钊都做得很称职，“没见过做事这么认真的。”

从女炮班出来之后，李卫萍在大陈镇做妇女工作，之后又到椒江椒渔办事处、白云街道等地工作。

李卫萍离开大陈岛之后，岛上的部队也陆续撤离了。当她再次以游客的身份，重新踏上大陈岛，她看到曾经踏平的黄土地，早已杂草齐腰。“大陈岛开发了，已经是另一番样子了，不过岛上的老人还能认得一些。”

那个扎着辫子，在训练场上流汗流泪的女炮手，已经成了她过往的记忆。

五年前，瞄准手王冬梅碰到李卫萍。她说：“卫萍啊，手痒啊，我们弄一些炮弹打一打。”

“你还能打？”李卫萍笑着问。王冬梅回答她说：“我保证。”



本版老照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